

2012 . 3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刊
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

日語學習与研究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ND RESEARCH

中日词汇交流与近代新词研究

- 1 回顾与前瞻——日语借词的研究
- 10 以黄遵宪《日本国志》(1895)为语料的日语借词研究
- 19 《时务报》(1896—98)中的日语借词
- 29 围绕近代「新漢語」的一些问题
- 39 新漢語定着の語彙的基盤
- 48 『英華和訳字典』中出现的日语新词

日语语言研究

- 56 中介语表达失当现象的考察与归因

日语教学研究

- 76 「全国日語專業八級考試」の
作文から見る共起表現の習得状況

日本文化研究

- 94 「遠慮・察し」式的交际方式

日本文学研究

- 107 唐代《金剛經》靈驗故事
与日本平安时代佛教说话文学的交涉关系考略



中国 北京

《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 年度 教育実習報告書 第 4 号

監修 河路由佳 (kawajiyu@tufs.ac.jp)

藤森弘子 (fujimori@tufs.ac.jp)

編集 菊池富美子・張善実・森本暁美

2006 年 3 月

東京外国語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科

日本語教育専修コース

目录

社 长：
施建军

副 社 长：
胡福印

编委会主任：
修 刚 李爱文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日平 于荣胜
马 骏 韦立新
王 勇 王志松
王健宜 刘利国
刘德有 曲 维
许宗华 李二敏
李庆祥 李运博
汪玉林 陈百海
邱 鸣 林少华
赵华敏 姚莉萍
徐一平 徐 冰
郭德玉 宿久高
彭广陆 谭晶华
潘寿君 戴宝玉

总 编 辑：
李爱文

副总编辑：
姚莉萍
吴英杰

责任编辑：
于 丽 马 骏
付 萌

特约审稿人：
韦立新 王健宜
朱京伟 何华珍
沈国威 邱根成
杨洁人 施建军
俞晓明 曹大峰
翟东娜

英文校注：
Andrew MacNaughton

版面编辑：
李广悦

■ 中日词汇交流与近代新词研究

回顾与前瞻

- 日语借词的研究 沈国威 1
- 以黄遵宪《日本国志》(1895)为语料的日语借词研究 刘凡夫 10
- 《时务报》(1896—98)中的日语借词
——文本分析与二字词部分 朱京伟 19
- 围绕近代「新漢語」的一些问题 陈力卫 29
- 新漢語定着の語彙的基盤
——『太陽コーパス』の「実現」「表現」「出現」と「あらわす」「あらわれる」など
..... 田中牧郎 39
- 『英華和訳字典』中出现的日语新词 李运博 48

■ 日语语言研究

中介语表达失当现象的考察与归因

- 一项基于中国日语学习者语料库(CJLC)的研究 毛文伟 56
- 模因视阈下日语流行语的传播 唐向红 63
- 明治期东京语中“命令表达+终助词”的研究
——从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 陈慧玲 69

■ 日语教学研究

「全国日本語專業八級考試」の作文から見る共起表現の習得状況

- 名詞と形容詞／形容動詞の共起表現を対象に 安藤美保 76
- 日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 侯 越 85

■ 日本文化研究

「遠慮・察し」式的交际方式

- 以「甘え」的心理分析为中心 杜 勤 94
- 日本的地震神话 张正军 100

■ 日本文学研究

唐代《金刚经》灵验故事

- 与日本平安时代佛教说话文学的交涉关系考略 李铭敬 107
-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以《大地之子》为例 鲍 同 姜毅然 116

■ 书 评

一朝长安花 几度平安春

- 评李宇玲《古代宫廷文学论》 张龙妹 廖荣发 124

■ 信息专栏

- 新版书目 9 47 93 106 115
- 北京成立“东亚古典研究读书会” 55
-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成立 55
- “电子辞典在日语教学中的研究及案例成果征集活动” 84
-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换届大会在天津举行 127
-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简介 封三
-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风采(单人图片:日语系主任 祝玉深) 封四

回顾与前瞻

日语借词的研究

日本关西大学 沈国威

[摘要] 20世纪初叶大量日语词汇流入汉语,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本文在近代知识环流的视角下,对日语借词的发生契机、传播普及过程及语词形式、语义特点等做了鸟瞰式的描述;对日语借词研究的基本方法、任务作了探讨。文中指出:日语借词与来自其他语言的外来词不同,是近代汉字文化圈新词的一部分,是东方接受西方的产物;对日语借词的考察大大推动汉语词汇乃至汉语本体的研究,同时也是亚洲近代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

[关键词] 近代新词 日语借词 语言接触 词汇交流

引言

二十余年前,笔者曾在《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的小文,那是笔者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的提纲^[1]。拙文发表前后,日本国语学界正处在近代汉字词汇研究的热潮中,笔者的一系列研究也都大大得益于日本先学的丰硕成果。四分之一世纪倏忽而逝,日语借词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如,荒川清秀的专著『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地理学用語を中心に』,以「熱帯、寒帯、回帰線」等地理学术语为例,考察了新译词的传承(由耶稣会士到新教传教士)和传播(由中国到日本,再回流中国);陈力卫著『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探讨了日本的汉字词创制普及的问题;朱京伟著『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人文科学と自然科学の専門語を中心に』对哲学、植物学、音乐方面术语的形成和交流进行了考察。这些研究在考证力度和资料发掘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近年,留日回国的学者如李运博、刘凡夫等亦有专著出版,更可喜的是很多年轻学者以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为研究对象撰写硕士、博士论文。现在日语借词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日语词汇或汉语外来词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汉语本体研究以及近代的历史、思想

史、社会史、文学史、科技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化也对日语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似有必要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日语借词研究做一番总结和展望。

1 什么是日语借词

日语借词顾名思义就是借自日语的词语。汉语中有(或者曾经有过)很多外来词,日语借词也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日语借词又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别于来自其他语言的借词,即(一)发生的契机;(二)意义上的特点;(三)形式上的特征;(四)独特的普及定型过程。首先,与日常生活或商贸活动引起的外来词不同,日语借词以近代西方新知识的引介为契机,所以从词义特征上看,以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居多,如:「哲学、科学、常識、客観」等;日语借词中还有很多是利用中国典籍中的旧词来表示新的外来概念,如:「革命、社会、民主、共和、銀行」等;表示外来文物的具体名词也为数不少,如:「電話、化粧品、溫度計」等;近代科学知识中必不可少的学术用语也是日语借词中重要的一部分^[2]。日语借词在词形上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极少几个单音节词以外,都是多音节词,其中双音节词又占绝大多数。日语借词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构成“同形词”^[3]。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如此众多的

同形词只能认为是近代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结果。此外还应提及的是与其他外来词相比,日语借词的残存率极高。例如《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所收录的其他语言的外来词几乎都成了废词、死词,唯独日语借词仍然作为常用词语在继续使用。

日语借词按照在其日语中的性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日语固有词,也称「和語」,即来源于古日语的词语。这部分词一般采用训读形式,也有若干词为混合型,如「場所」。在江户时期这些词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进入明治时期后有一部分为法律文本所采用,如「取消、引渡、場合、打消」等。这些词主要通过日语法律书籍的翻译借入汉语。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一部分已经脱离了法律意义,另外一些词则仍保持着法律专用词语的属性。一些词在借入时做了词形调整,如删除假名等。日语固有词以音译词的形式借入汉语的情况极少,现代汉语中似乎仅“榻榻米”一例^[4]。(2)江户时代以来的汉字词。即日本人为了接受西方的新概念而创制的新词、译词。使用汉字,采用音读方式是这类词的最大特征。从与翻译源语言的对应形式上看,这部分词可以分为:音译词、摹借词、意译词,还有混合词和少量的造字词。现分别举例如下:

(a)音译词

音译词传入汉语的数量较少,例词有:「瓦斯、華氏、摂氏、俱樂部」,「白亜紀、侏羅紀、泥盆紀、志留利亜紀、寒武利亜紀」等地质学名词^[5]以及「米、瓦」等度量衡单位名词。音译词在江户时代的兰学译书中就已经出现,对于兰学家来说,用汉字去音译荷兰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主要用于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6]。兰学书的音译词有尽量回避字义的倾向,但是也有「華氏、摂氏」等音义结合的译词。另一个常被当作音义结合范例的词是明治期的「俱樂部」^[7]。明治中期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日语的音译词直接使用片假名,借入汉语的可能性遂消失。对汉语来说,日本人用汉字进行的音转写并不准确,但是由于是以汉字的形式借入汉语,所以一般不加以改动。

(b)摹借词

即直译词,如「盲腸、植民、鞏膜」等。荷兰语的一个特点是单词较易分解成语素,所以兰学家

很早就掌握了直译法,并在译词创造过程中加以运用。直译法对明治以后的译词创造也有较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初期的译词常常采用直译法创造^[8]。

(c)意译词

如「神經、哲学、前提、客観、常識、悲劇、義務、演説」等。随着日本人外语知识的增加,意译词逐渐增多。

(d)其它

如音译意译混合型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种是利用造字的方法新创建的译词,造字新词数量不多,现在日语中仍在使用的有「腺、臍、臍」等。三者都曾传入汉语,但是现在还在继续使用的似乎仅有「腺」一词。

从发生上看,上述词语都是经日本人之手创造的,故又被称为「和製漢語」^[10]。下面我们还会提到另一类词,虽然造词的过程是在中国完成的,但在意义、用法上受到了日语的深刻影响。

2 日语借词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为什么要研究日语借词?中日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同形词,其意义用法上的异同首先是汉日外语教学的重要内容。除了外语教育上的实用性原因以外,解明同形词产生的前因后果等词源上的探求心则可以说是日语借词研究最朴素的动机;而近代以后复杂的中日关系又给研究者们带来不少民族主义的冲动。但是笔者曾反复指出,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解决中日之间语词借贷取予的“恩恩怨怨”,而是有着更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日语借词作为近代汉字新词,其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词汇史研究范围。亚洲的近代是东西方冲撞、融合的时代。表达西洋近代文明的新概念随着西方列强贸易和军事的扩张如怒涛一般涌入东方。东方各国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努力接受这些新概念。而古老的汉字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则成为汉字文化圈各国接受西方文明时的惟一选择。语词是概念的载体,汉字新词是近代诸种概念得以成立的物质保障。如此创造出来的大量新词译词,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被称作“新名词”^[11];而在日本近代词汇研究中,则被称为「新漢語」,即用汉字构成的新词。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新

旧词汇更替的现象,但是,近代的汉字新词有着其特殊性,这些新词超越了汉语、日语、朝鲜语等个别语言的框架,是汉字文化圈在接受西方新概念时共创、共享的产物^[12]。

应该说近代新词的发生并非汉语、日语独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有着被称为“西学东渐”这一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强烈外界动因。近代新词的形成并不是局限在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之内的事,而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地区如何用“汉字”这一超语言的书写符号来接受西方新概念的问题,因此必须放在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形成的背景下,放在“近代”这一历史脉络中,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语”获得的问题加以思考。具体地说,主要有三部分内容。

首先是汉语词汇乃至汉语本体研究的需要。近代以降,汉字文化圈域内的各种语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汉语也不例外。王力曾指出,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佛教词汇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中略)现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13]。而这些所谓的“西洋词汇”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来自日语,或者说和日语有着意义用法上的关联。因此,现代汉语词汇史以及包括词汇体系在内的现代汉语形成史的研究都无法绕开日语借词。例如《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语文工具书对这些新词的来龙去脉鲜有涉及,《近现代汉语新词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以近代新词为对象的研究,其中一部分新词溯源也因为未能利用日本的研究成果而成了无源之水。凡此种种都说明想要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做出完整深入的描述,尤其是其中绝大部分抽象词汇的词源考证必须借助于日语借词研究的成果。

第二是学术用语研究的需要。近代的科学知识体系需要一整套新的术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例如「自由、民主、個人、權力、義務…」等重要词语,其概念的引介、词汇化、普及、变异、定型等过程的廓清不仅是词汇史层面上的问题,同时还

是近代历史、思想、文学、社会等研究领域的课题;甚至可以说,所有冠有“近代”的史的研究都将与日语借词发生密切的关联。同样,在自然科学领域,术语的形成是学科建构史研究极其重要的内容。例如「原子、分子、細胞…」等术语的发生、普及、定型过程的描述是学科建构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这样的研究毫无疑问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们的参与,因此,日语借词研究必然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

第三是关于东亚近代化过程研究的需要。关于这一点,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不做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笔者的网页上获取相关信息。

3 日语借词研究的两个侧面

词汇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新词的形成需要经过两个步骤:一是造词;二是社会的认同。造词常常是个人行为,这只是概念的词化,是第一步;新词还必须得到语言社会的认同才能成为该语言词汇体系的一员。造词当初风行一时,终被弃如敝屣的新词数不胜数。在外来词研究中,原词的造词情况一般并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例如“沙发”、“克隆”等能成为现代汉语的单词与其在原语言中的情况并无直接联系。而日语借词则不然,这是因为日语借词和来自其他语言的词语不同,其本身就是一个“共创共享”的结果。“共创”意为中国和日本共同参与了包括日语借词在内的近代汉字新词的创制;“共享”是说这些中国或日本创制的新词通过书籍和人员的交往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同形词的形式成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财产。“日语借词”这一名称本身并不包含造词过程的因素,但是日语借词的研究必须包括造词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前者的研究内容有造词的时间、地点、造词者、造词法、新词的理据等。中日之间在造词、翻译方法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王力曾指出:某些译词“如果汉人先译,可能也是这个样子”,而另一些词“如果汉人先译,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14]。我们需要思考哪些因素会造成这种差异。而“共享”是指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地区跨语言地接受、认同汉字新词的问题。这实质上是近代东亚所发生的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过程。关于“共享”的研究主要包括词汇

中日词汇交流与近代新词研究

交流的媒介、方式、受容方的反映、与原有词语的互斥、意义的变异等内容。日语借词研究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传教士或严复创制的译词为何会被日语借词所取代?王国维指出“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王国维举了很受一部分国人推崇的严复的例子与日制译词相比较,评论道:Evolution 严译“天演”,日译“进化”;Sympathy 严译“善相感”,日译“同情”,“孰得孰失、孰明孰昧、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15]。王国维还说:“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所以国人“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16]。也就是说王国维认为日本的译名比中国自创的译名更准确,更符合汉语的发展方向(双音节词)。但是笔者认为新词能否得到语言社会的认可,造词法、理据(即命名的理由)等虽然重要,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以“天演”和“进化”而论,严复在《天演论》中试图分别用“天演”表达自然的演化,用“进化”表示人类道德的升华。从造词的理据上看,“天演”没有人价值的取向的含义,要优于“进化”^[17]。但是严复的“天演”终究没能抵御日本译词「進化」。类似的事实告诉我们大量的日语借词涌入是历史时代所使然,我们需要放眼社会接受,即交流的过程,找出当时社会的因素。

4 近代汉字新词与日语借词:创制与交流

日语借词是近代汉字新词的下位类。近代汉字新词尽管其绝大部分形成于19世纪,但是其创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来华耶稣会士的西学引介。康熙、雍正朝以后的严厉禁教,使得西学的导入和随之发生的造词活动中断了近百年,但是“非汉语母语使用者的造词”这一耶稣会士和19世纪以后的新教传教士的共同特点,以及两者之间在译词上的传承关系都使我们无法忽视这段历史。

从利玛窦1582年进入澳门(定居北京为1601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间有三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新词的创制也不可能是均质的。笔者曾以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1807)为分歧点,将此前后的二百多年间耶稣会

士们的译述称为“早期汉译西书”,其中所使用的译词称为“早期译词”;而将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的译述称为“后期汉译西书”,其中所使用的译词称为“后期译词”^[18]。19世纪是主要的造词时期,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准备期:1807~1840年前后

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登陆,在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下,马礼逊,以及其后来华的传教士们只能通过翻译圣经、出版定期刊物等方法传教,即“文书传教”。传教士们在这一过程中创制了很多译词新词,在宣教的同时实际上促进了西方知识的普及。该时期的西书多在南洋印刷,中国大陆禁止流传,所以实际读到这些印刷品的人不多,影响有限。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为《海国四说》、《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中国士子撰述的书籍所征引,成为当时关心海外情况人士的共同知识。《海国图志》等在下述的发展期,以重版、改订版的形式广泛流传,并流入日本。这一时期造词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较少,很多译词具有强烈的口语、俗语的色彩,为中国士大夫所诟病。

发展期:1840~1860年前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取消了对外国人居住、传教的限制。西学的中心转移至上海,西人的出版事业愈发活跃,墨海书馆的成立即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在墨海书馆传教士们第一次得到了如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等中国当时第一流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国士子的参与不仅大大提高了传教士译述的可读性,而且使他们得以通过《四库全书》等官方资源了解和继承了耶稣会士的丰富遗产。后期汉译西书在1859年以后开始自由地进入日本,书中使用的词汇取代了当时日本已经广泛使用的某些兰学系统的译词。

清政府主导翻译期:1860~1880年前后

麦都思、伟列亚力相继回国,艾约瑟迁居北京以后,墨海书馆逐渐名存实亡。其宗教书籍印刷业务为美华书馆取代,西学的翻译则由北京的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继承。但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翻译方法,即传教士口述,中国助手笔录,被延续下来。翻译内容的选定也忠实地执行了洋务派官僚的意图,以技术、制造

等所谓的“西艺”书籍为主,西方人文科学的内容绝无仅有。在这一时期,除了化学、数学等有限的领域外,在词汇方面汉语对日语的影响逐渐减弱。

停滞期:1880~1895年

这十几年是政治上闭塞感极强的时期。清政府主持的翻译机关在翻译方法、内容上毫无起色,不能顺应时代变化。来华传教士大会上虽做出了统一译词、术语的决定,但并没有得到落实^[9]。而与此同时日本则逐渐完成了术语类的制定,近代词汇体系得以建立,已经无需再从中国借用词汇。或者说,中国已经无法满足日本在译词、新词方面的要求。福泽谕吉鼓吹“脱亚入欧”论,中国对于日本已不再是新知识的来源。不仅如此,甲午前后日本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地区输出新词。这一时期,中国官吏作为外交人员,或出国考察,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有了直接接触日语的机会。在他们的视察报告、纪行文字中收录了大量的日制译词、新词。但是,他们的这些记录有很多直至甲午以后都未能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同时,整个知识体系的滞后,使中国士子不具备阅读,理解例如《日本国志》等文献的能力。

日本书翻译期:1895~1919年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吸收西方知识。先觉者和留学生自主的翻译取代了传教士们的工作。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除严复等少数人以外,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学日本的人翻译日语图书,或从日语转译西方书籍。这导致了大量日制译词、新词流入汉语。

日语借词虽然采用汉字词的形式,但并不都是中国典籍中的,或在中国创造的词。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和製漢語」,即日本人创造的新词、译词。日本人有意识地使用汉字创造新词始于江户中期(18世纪中叶)以后“兰学”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

兰学时期:1770~1860年前后

1774年日本的兰学家第一次翻译出版了欧洲语文的医学书《解体新书》。这是日本知识阶层第一次从事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翻译实践。在翻译的过程中日本兰学家认真地思索了译词创造的各种问题。其后,兰学译籍陆续问世,至19世纪50

年代,医学(尤其是解剖学、眼科学)、化学、植物学、军事(近代军事知识、火器制造等书籍的翻译开始于40年代,主要契机是西方国家的威胁和国内的动乱)等方面的词语已经初具规模。特别是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和译词创造模式。

英学时期:1860年代以后

美国佩里舰队的来航,迫使日本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时在海外新知识的吸收方面,开始从荷兰语转向英语。西周、福泽谕吉等许多兰学家都自觉参与了这种转变。1859年横滨开港后,大量的中国汉译西书、英华辞典舶来日本,日本的知识分子借此迅速地掌握了英语。进入明治期以后,人文科学方面的译词创造取得了进步。1890年代伴随着言文一致的实现,基本完成了近代词汇体系的创建。

以上是从新词创制的观点进行的分期。如果从词汇交流的角度加以整理,从19世纪初到70年代为中国新词输出期,即汉语自己创制新词并向日本输出的时期(但这种输出不是主动的行为)。70年代末到甲午战争(1894)为对抗期,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甲午以后到五四运动的20年间为日本新词输入期,即汉语从日本引进新词的时期。当然,上述的时期划分是就大致的倾向而言。在甲午之前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日语新词的传入,而进入20世纪以后汉语也不是完全失去了对日语的影响。

5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与日语借词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知道中日同形词中的近代新词部分有一段汉字文化圈新词创造与共享的历史。中国和日本是主要的创造者,朝鲜半岛,越南参与了共享。从语言接触和词汇交流的角度考察,汉字文化圈近代新词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中日流向词,(二)日中流向词,(三)中日互动词。分别简述如下:

(一) 中日流向词

其词语流动方向可以表示为:“中→日”,流动的时间上限为16世纪末,下限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二百多年时间又可以细分为两期:第一期是耶稣会士创制的新词译词,通过他们的译述和

中日词汇交流与近代新词研究

同时代的中国士子的著述(即前期汉译西书)传入日本,为日语所吸收。传入的词语以基督教、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等领域的词汇为主。这些词主要为兰学家所接受,用于荷兰书籍的翻译。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和海外信息的流入都受到了极大限制。但是就图书而言,洋书之禁时紧时弛,1720年,将军吉宗放松对宗教以外的图书的进口管制。同时,进口管理上虽然严格,但对图书在学者之间的流通并不加以取缔,这使词语的吸收成为可能。18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的禁教政策,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著述受到限制,已经不再有新的西书出现。词汇的流入也陷入停顿状态。第二期可以从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登陆广州算起。新教传教士创制的新词译词,主要通过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等(即后期汉译西书)传入日本,成为现代日语的词汇。1859年日本正式开放门户,国外图书的流入不再受限制,大量的汉译西书传入日本^[21]。进入日语的前期汉译西书的译词有:“几何、病院、地球、热带、温带、赤道”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的术语;后期汉译西书的译词有:“银行、保险、资本、陪审、电气、电报、化学、植物学、细胞、铅笔、阴极、阳极、-炎”等,以及大量的数学术语。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初步完成了以人文、科技术语为主的近代词汇体系的建构,而中国引进西学的停滞,使中国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新的词语,汉语向日语输入词语遂趋于结束。但是,个别词语流入的情况还是存在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又有一些汉语的流行词语,如“万元户”、“电脑”等新闻、商业词语介绍到日本。

(二) 日中流向词

其语流动方向可以表示为:“日→中”^[22],日语借词主要是指这一部分。这些由日本的兰学家或明治维新以后的启蒙家、翻译家所创制的译词新词(即「和製漢語」)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为汉语所吸收。明治以后访问日本的中国官吏、文人曾在视察报告或游记中不同程度的使用了一些日语词汇,但是中国的读者较容易接触日语词汇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例如《时务报》(1896~1898)是最早引入日语词汇的媒体之一。到五四运动前后(1919)中国言文一致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日语

的接受也告一段落。在这之后,日语词汇的流入成为个别现象,主要有三种:第一,中日战争时期的「時局語」,这种词语受语境影响较大,如「工事、番号」等都只具有军事上的意义。第二是东北沦陷地区的「協和語」,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混合语(pidgin),已经逐渐消失。第三,晚近的日本词语。1949年以后,日语的流入绝无仅有,「献血」是少数词语中的一个。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又有大量的日语新词流入汉语。这部分尚未或正在定型的日语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三) 中日互动词

中日互动词是指那些在词语形成及普及定型的过程中,中日双方均以某种方式参与其间的词,词语的流动方向可以表示为“中→日→中”。从这个简单的图示中可知,“中日互动词”首先产生于汉语,其后传入日语并定型;19世纪末又从日语回流汉语。所以又被称为“词侨回国”或“回归词”^[23]。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里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中国典籍(含佛教典籍)、白话小说、“好书”中的词语^[24],被日本借用来做译词,获得了与西方语言相对应的新意义后又回流中国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一员,如:“革命、共和、民主、关系、影响、卫生、印象”等。日本使用中国古典词作译词与兰学和明治初期尊重汉学的风潮有关。另外一种情况是,汉译西书等的译词由于某种原因在中国未能得到普及,或者没有能最终完成译词的进程。但是这些词传入日语以后与外语的对译关系得以确定,成为近代新词。这些词在进入日语、返回汉语的过程中词义等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是其在现代汉语中的普及、定型借助于19世纪末以后的日本书籍的中文翻译。例如“细胞”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韦廉臣、李善兰、艾约瑟合译的《植物学》(1858)。传入日本后成为植物学、解剖学的术语,并由此衍生出了「細菌」。但是,在中国李善兰等的《植物学》之后无人使用“细胞”。甚至连参与翻译的艾约瑟在自己以后的译著也另起炉灶,新造了“微胞”。类似的例词还有“野蛮、热带、望远镜”等。还有一些词,经过变化,不再是同形词,而是“近形词”,如《英华字典》的“现银”被改造成「現金」;汉语的“前列腺”被改造成「前立腺」等。在考察渊源关系时对此也应该加以考虑。

上述情况说明:廓清汉语新词的来龙去脉必须

考察日语借词,而日语借词,乃至日语的新词的解明也离不开汉字新词整体情况的把握,我们需要在汉字文化圈的视野下讨论新词的创制与定型。

6 日语借词研究的两大任务

关于日语借词的是非,自从其大规模进入汉语那一刻(20世纪初)就争论不断,正如王国维所说“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25]。胡以鲁的《论译名》(1915)是最早的词汇学视角的研究^[26],有关日语借词的研究史,请读者参阅拙著“绪论”部分^[27]。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审视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我们现在需要从定性、定量的两个方面对日语借词进行研究。

所谓定性就是汉语中来自日本的语词应该如何定位?算不算借词(外来词)?能否把日语借词和中国人的造词等同起来?这些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有过一次不了了之的讨论。孙常叙把汉语中的日源词称为“借取书写形式的特殊借词”,首次使用了“日语借词”这一术语^[28]。其后,王力的《汉语史稿》,北京师范大学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与发展》^[29],虽然在定义和范围上没有做出明确的界说,但都认为来自日语的词是外来词。马西尼将汉语的词汇分成三个基本部分,即:固有词(traditional or classical lexicon),借词(loans),新词(new formations or neologisms),又在借词项下设置了借音词(phonemic loans)和借形词(graphic loans)两个下位类,明确地将来自日语的词语作为“借形词”典型事例加以论述^[30]。此后,许多汉语或词汇学的专著都在外来词的章节加入了关于借形词的讨论^[31]。

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或地区直至19世纪中叶或更晚的时间,汉字是共同的正式书写系统,这使汉字文化圈域内的以借形为主要形式的词汇交流成为可能。笔者认为日语的成分在进入汉语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汉字的形式,将其称之为“借形词”是适当的。但是同时,汉字的形体本身也传递了某种意义或引起某种联想,因此借形词必然会带来词义理解上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汉字形式的词可以借自汉字文化圈其它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借自于古人。对典籍中的旧词,

尤其是那些已经废弃不用的死词,赋予新义也是近代新词创造常见的方法。研究者们对借音形式的外来词研究比较多,对借形词则关注得不够。

所谓“定量”就是从数量上把握日语借词。现代汉语中日语借词有多少?都是哪些?王立达在1958年的论文(《中国语文》第68期)中列出了589个日语借词;高名凯、刘正琰合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人民出版社,1958)第三章专设一节讨论日语借词问题,共收词459条。刘正琰主持编纂的《汉语外来词词典》共收录来自日语的词语892条。但是迄今为止的日语借词清单所例示的词语显然还不是日语借词的全部,从数量上把握日语借词的全貌是汉语现代词汇体系形成研究上不容回避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对现有日语借词“清单”中的词语进行验证,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现代汉语中多音节词语进行全面的词源考证,发现「和製漢語」和「中日互动词」。前者将告诉我们日本人创造新词译词的理据倾向、造词法特点等具体情况;后者将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国古典词或传教士译词和现代汉语词汇的传承关系。但是,汉语常用词汇有数万条之多^[32],颇有无从下手之感。笔者认为编纂《中日语词借贷词典》,即对汉语中中日同形词进行横跨汉语、日语的考证是有效的方法。搞清了同形词的来龙去脉,新词创造、跨语言交流,乃至日语借词也就水落石出了。这一词典将为汉语的大型工具书近代词汇的记述提供资源,也是东亚如何接受西方新概念这一近代概念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7 结 语

在中国和日本的长期文化交往中,中国一直是知识的提供者。从汉唐的律令制度、典籍诗文,到宋明以后的朱子理学、白话小说,汉文化对日本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耶稣会士的汉译西书也为日本带来了不同于汉文化的新知识。而江户中期以后,日本开始从荷兰书籍直接汲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进入明治期以后,日本启蒙家、思想家等在接受来自中国的西学成果的同时,吸收消化了西方新的知识体系。他们创制的大量汉字新词最终以中日同形词的形式流入汉语和东亚其他语言,促进了各语言

的近代化进程,成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财产。那么日语借词究竟给汉语带来了哪些变化?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日语借词为汉语提供了包括各学科基本术语在内的数千个词语,使我们有可能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形式来谈论近代以后的新知识;第二,日语借词为实现汉语从文言文向口语文的过渡,语言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在词汇

上做好了准备;第三,大量日语借词同时为汉语词汇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一批造词成分和造词模式。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多少世纪以来,汉语在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的词汇里泛滥着,可是反过来,没有接受过什么”^[33]。萨氏的论断对于19世纪中叶以前的情况或许是正确的,对于19世纪以后则不尽然。这是一段值得我们认真审视的历史。

注

- [1] 笔者的博士论文于1994年以《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笠间书院)为题刊行(改订新版2008年)。另,包括本文言及的论文在内,笔者的主页内(<http://www2.itc.kansai-u.ac.jp/~shkky/>)有相关研究的资源,欢迎访问。
- [2] 尽管本文的讨论不涉及那些过于专业化的术语,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随着教育的普及及知识的大众化,大量的专业术语已经逐渐变成一般性词汇,各学科的基本概念词尤其如此。
- [3] 对那些如繁体字、简体字,日本新汉字等字体上及自语言正字法上的细小差别暂忽略不计。
- [4] 在台湾,日语音译词可能要多一些,如“奥巴桑”等。
- [5] 沈国威. 1995.『新爾雅』とその語彙[M]. 白帝社. p:46~48. 中文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 [6] 沈国威. 2007. 日本的兰学译词与近代汉字新词的创制[J]. 中国学术. 第23辑. p:152~186.
- [7] 是否有中国人参与其中是一个谜。“俱乐部”的首例书证为1884.12.26的《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在此之前一般用“苦乐部”。这段文章报导了接纳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为名誉会员的消息。“苦”改“俱”是否有徐氏的功劳不得而知。参见广田荣太郎. 1969. 近代译语考[M]. 东京堂出版. p:250.
- [8] 沈国威. 2003. 明治の学問の用語[J]. 日本语学. 22卷12期. p:34~44.
- [9] 沈国威. 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1. p:121~134.
- [10] 所谓「和製漢語」在构词、理据上都与中国典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寻找并重现这种关系也是日语借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11] 世纪之交的“新名词”是包括日常词汇在内的“近代新词”的下位概念。毫无疑问,近代词汇的研究不应拘限于以抽象词汇为主的“新名词”,而应该与生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词汇研究互相补充。
- [12] 汉字文化圈应包括以下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其中越南和朝鲜半岛完全,或基本上不再使用汉字,但是,即使在今天,汉字所体现的汉“音”依然是强有力的新词创造成分。尽管在不同的语言中,汉字的发音有很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存在着体系上的对应关系。
- [13] 王力. 汉语史稿[M]. p:516.
- [14] 王力. 汉语史稿[M]. p:329~331.
- [15] 我们应该注意,王国维将日人造词和国人造词完全等同看待了。其实两者之间有较大分歧。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的。
- [16] 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J]. 教育世界. 第96号. 1905. 4. 收《王国维遗书》卷5《静安文集》[M].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 [17] 例如“盲肠”是进化的结果还是退化的结果?有时人们不得不强辩“退化也是进化”。
- [18] 沈国威. 1998. 新漢語研究に關する思考[J]. 文林. 32号. p:38~61. “早期汉译西书”日语为《初期漢訳西書》. 亦参见佐藤亨. 1986. 幕末・明治初期語彙の研究[M]. 櫻楓社. 荒川清秀. 近代日中学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M].
- [19] 参见王树槐. 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J].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69. 1. p:47~82. 王扬宗. 清末益智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 中国科技史料[M]. 第12卷. 1991. 2. p:9~19.
- [20] 参见沈国威.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M]. p:69~72.
- [21] 但是翻刻出版还受到严格的限制。幕府有专门的审查机关,很多翻刻出版申请被拒绝。
- [22] 日语词汇的流入在中国常常被称作“逆流”,我们应该注意“逆流”一词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因素。
- [23]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1959.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 p:78;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 p:8.
- [24] 即教诲臣民如何做一个“好人”、或“好官”的书,代表性的有《圣谕广训》的宣讲书、《福惠全书》等。这些书对日本近代的汉字词汇都有较大的影响。这部分词在汉语中有较强的俗语性质。同时,对那些偶然相同的文字串应该做区别对待,不能因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某个文字串,就说日本对中国古典词加以改造,创制了新译词。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有一些词,日语的影响度并不容易确定。
- [25] 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J]. 教育世界. 第96号. 1905. 4.
- [26] 沈国威. 2005. 译词与借词—重读胡以鲁《论译名》[J]. 或问. 第9号. p:103~112.
- [27] 沈国威.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M]. p:13~57.

- [28] 孙常叙. 汉语词汇[M]. p:309 ~ 311.
- [29]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组. 1959.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与发展[M]. p:76 ~ 82.
- [30] 马西尼.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M]. p:128 ~ 129.
- [31] 如史有为前引书. p:16 ~ 19. 曹伟. 2001. 汉语精讲[M]. 北京大学出版社. p:96; 曹伟. 2004.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M]. p:97 ~ 100.
- [32]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课题组编. 2008. 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M]. 商务印书馆. 共收56008条词, 其中多音节词为52842条.
- [33] 萨丕尔. 1964. 语言论[M]. 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p:121.

作者简介: 沈国威(1954—) 男 汉族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 日语教学研究、中日词汇交流史研究

联系方式: E-mail: shkkyz@gmail.com

The Study of Japanese Loanwords: Retrospection and Prospects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words entered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ch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system.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rivation and spread of Japanese loanwords as well as their forms and semantic featur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basic methods and goals of the study of Japanese loanwords from a perspective of modern knowledge transfer. Two important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ly, Japanese loanwords are different from loanwords borrowed from other languages, in as much as they are one part of the new vocabulary in the Chinese-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and the result of the spreading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Secondly, the study of Japanese loanwords will greatly stimulate the study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even Chinese itself, and it will make an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Keywords: modern new words; Japanese loanwords; language contact; vocabulary exchange

Author's Information:

Shen Guowei(Male) Year of Birth: 1954 Professor at Kansai University Japanese Teaching Study

E-mail: shkkyz@gmail.com

新版书目

书 名	书 号	作 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实用日语: 中级(下册)	978-7-301-20202-9	彭广陆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
日语会话教程 1	978-7-5135-1715-7	庄凤英	外研社	2012. 3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精讲	978-7-5135-1753-9	桂玉植	外研社	2012. 3
日本古典文法	978-7-5135-1873-4	崔香兰等	外研社	2012. 4
大家的日语 初级2 句型练习册	978-7-5135-1751-5	平井悦子	外研社	2012. 4
大家的日语 初级1 句型练习册	978-7-5135-1776-8	平井悦子	外研社	2012. 4
日本商务礼仪达人	978-7-5135-1875-8	椿武爱子	外研社	2012. 4
日语专业八级考试综合辅导与强化训练	978-7-5135-1766-9	王源	外研社	2012. 4
商务日语翻译技能教程. 笔译分册上	978-7-5611-6838-7	李锋传主编, 徐冰主审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4
商务日语翻译技能教程. 笔译分册下	978-7-5611-6837-0	李锋传主编, 徐冰主审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4

以黄遵宪《日本国志》(1895)为语料的日语借词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 刘凡夫

[摘要] 本文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语料,考察了近代早期的中日语言接触。通过语料调查与梳理,对该书中日语借词的生成、使用及传播过程进行了考察,对其词源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进入汉语的日语借词包括日语既有汉字词、日语汉字新词,还包括回归的汉语本族词。日语借词在进入汉语的同时,开始呈现由理解词汇向表达词汇转化的迹象。在戊戌变法期很多革新派的文论中,已显露出这些日语借词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国志 日语借词 新词生成 容受轨迹 传播与影响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80年代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但近代中日间的语言接触时间跨度、大涉及资料浩瀚,给这一领域的系统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因此,通过语料的发掘与考察,来充实与完善汉语中日语借词的研究,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文字规模大,内容丰富,且传播范围广,是研究近代早期中日语言接触的重要资料。本文将《日本国志》为语料,通过对该语料的调查与梳理,来考察近代早期中日两国语言中新词的生成,探究汉语对日语借词的容受,观察日语借词在汉语中的传播与影响。希冀本文对廓清日语借词产生、使用、普及、定型的全过程有所贡献。

1 《日本国志》的语料价值

1.1 《日本国志》的文本

《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史学家和思想家黄遵宪花费8、9年心血完成的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1877年,黄遵宪受命出任驻日参赞,随同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到日本。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势的日益强盛,黄遵宪深感国内对日本的认识不足,这促使他下决心重点考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各种变革及其利弊得失,为国人了解日本提供借鉴。黄遵宪从1878年开始广泛收集各方面资料,并进行了大量的实

地调查与走访,凭借其顽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887年夏季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全部书稿。

《日本国志》是一部50余万字的宏著,由12志40卷构成。该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现状及明治维新后推行新政、由弱转强的各项举措,因此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1]。但由于书中曲折地表达了效仿日本、变法求强的思想,为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所不容,直遭摒绝,不得行于世^[2]。直到8年后的1895年冬,才得以由广州的一家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付印发行。

《日本国志》刊行之时,正值甲午惨剧发生后不久,该书为重创之后渴望了解日本的国人提供了极为系统的知识。因此,问世后很快就广为流传,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被多家书局刊刻。据考证,《日本国志》1895年刊行后,至今已有羊城富文斋初刻本、羊城富文斋改刻本、浙江书局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上海书局石印本、丽泽学会石印本、汇文书局木刻本等10种版本^[3]。本文使用的文本为1898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该文本1968年为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是目前较易查阅的文本。

1.2 《日本国志》的语料价值

《日本国志》不仅对近代史学、法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语言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书是近代早期中日语言接触的语料,通过该语料,可探讨“西学东渐”文化大潮对两国语言的冲击,可考察中日文化互动对两国语言的影响,为中日语言发展史研究、中日词汇交流史研究拓宽新思路,提供新途径。

第二,该书中使用了丰富的汉字新词。在立足文本比对与辨析的基础上,对《日本国志》中出现的中日两国同形的新词进行个案研究,探源讨流,可为词源研究与辞书编撰提供借鉴。

第三,该书各志中以“外史氏曰”的形式所加的评论多达5万余言,这些评论文字,是黄遵宪表达自己变法思想的结晶。对这些评论中出现的词汇加以调查与梳理,可把握黄遵宪对待日语借词的态度,有助于了解日语借词由“理解词汇”向“表达词汇”^[4]转化的轨迹。

第四,该书文字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通过对书中语料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廓清日语借词生成、使用与传播的过程,还对揭示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预测语言的发展趋势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理解词汇”的日语借词,以《日本国志》为语料,本文将着重研究日语借词生成、使用与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探讨日语借词由理解词汇向表达词汇转化的轨迹。该语料中还出现了大量表示人名、地名、年号、官职的固有名词。由于固有名词历来对汉语的影响非常有限,所以,原则上这些词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2 日语既有汉字词的借用

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5],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有德川光圀的《大日本史》,青山延光的《国史纪事本末》,赖山阳的《日本政记》,岩垣松苗的《国史略》,蒲生秀实的《山陵志》,村濑栲亭的《芸苑日涉》等,涉及日本的正史、野史、笔记、杂录、行政报表等方方面面。黄遵宪从这些文献、资料中获取信息的同时,还从中借用了大量的日语汉字词。

本文通过检索《辞源》(1915)、《辞海》(1936)、《中文大辞典》(1968)、《大漠和辞典》(修订版1986)、《汉语大词典》(1986-93)等,对《日本国志》中二字以上词语(人名、地名等固有词汇除外)进行了筛选。对未被上述词典收录者,以及虽被收录却与古汉

语词义不同,或无出典者加以抽出,共获1281个词语。对所获词语,进一步检索《英华字典》(1866-69)、《和英语林集成》(初版1867,第二版1872,第三版1886)、《明治のことば辞典》(1986)、《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2002)、《近现代词源》(2010)等中日近现代词典及文献资料,考索其词源,共判明559个词语来自于日语。

这559个词语,按其承载信息的新旧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日语中既有的汉字词,一类为幕末·明治时期创建的汉字新词。所谓既有汉字词是与新词相对而言,是指近代以前生成的「和製漢語」和用汉字书写的「和語」。当对日本固有的事物或概念加以介绍时,由于汉语中没有适当的词语来表述,黄遵宪多将日语中既有的汉字词直接拿过来使用。书中常常是先举一事物,在其后以“曰~”、“名~”、“谓之~”等形式导出既有汉字词。如:

(1) 可用者每会议脱衣冠纵酒,结其欢心,名曰无礼讲。

(国统志二,十二页)

(2) 與将入门,数女迎之,名待女郎。

(礼俗志一,十页)

(3) 五月晦及六月十八日,在鸭河四条桥东洗净神輿,谓之御輿洗。

(礼俗志二,十二页)

对《日本国志》中借用的日语既有汉字词进行梳理后,按其词义分布领域,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与物产有关的词汇:

八丈绢、八丈紬、贝细工、鳖甲细工、城栈留织、池田炭、赤饭、袋物、鲸细工、镜饼、毛植细工、木栴、革细工、堆乌、干温鲑、海藻汁渍、海鼠肠、林檎、葛笼细工、竹细工、铸物、足袋、足结、足玉、佐织缟、奈良渍、羽二重、御影石、御輿洗、鱼粕、鰻、煎汁、煎肝、鰹盐辛、鰹节、角细工、油纸合羽、榨粕、真绵、寄木细工、晒木棉、筛绢、烧酎、杉原纸、味淋、味噌、纹缩面、手玉、手拭、水口笠、水飴、线香、蒲烧、粕渍梅、七宝器、渍蕨、志朵细工、织袴地、盐吹贝、索面、团子、挽物、牡丹饼、藤细工、樱饭、糖通、浮吴座、生麦、炼化石

2) 与日常生活器具有关的词汇:

叠、叠表、琉球叠表、厨子、钓台、建具、鸟帽子、雪踏、界纸、数奇屋、长持、黑棚

3) 与文化娱乐有关的词汇:

平假名、片假名、句读点、连读点、净瑠璃、艺妓、大夫、难波曲、能、都踊、踊、踊子、落语、田舞、田实节、猿乐、倭乐、吉志舞、音頭、芝居、高砂曲、王将、玉将、金将、银将、桂马、香车、飞车、角行、射的所、扬弓店、影绘

4) 与礼俗祭祀活动有关的词汇:

上无月、大忌、节供、大祓、晦日、高天原、勾玉、采女、神衣、神嘗、疫除、相嘗、鸟居、道饗、三枝、山车、山棚、待女郎、蛭子会、天照大神、御輿洗、无礼讲

5) 与旧律法制度有关的词汇:

防人、大学寮、蕃书调所、奉行、藩士、大名、大学头、关白、小老、大老、地头、式部头、秽多、非人、唐物使、法皇、国司、洋书调所、蕃书调所、虾夷、隼人、白状、押印、延喜式

6) 与商业活动有关的词汇:

茶屋、芝居茶屋、飞脚屋、质屋、料理屋、小判、大判、银判、豆板银

7) 与计量单位有关的词汇:

步、町、坪、段、通、间

8) 其他一般词汇:

里人、素足、女房、月次

上述既有汉字词的总数为178个,「和語」为多,也包括不少的「和製漢語」。部分词语如“厨子”、“大忌”、“采女”等虽在古汉语中可找到同形词,但两者间词义有很大不同,甚至只有训读,没有音读,本文也将其纳入日语既有汉字词中。

从总体数量上看,《日本国志》中借用的这一类汉字词并不少,但在该书使用的频率却不高,多数词出现的频率仅为1~2次。这主要是因为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其主旨是要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诸项新政及成就,而既有汉字词所承载的多为旧信息。当在介绍日本的物产、礼俗及国统等固有情况时,因汉语中没有可对应的词语,不得已而借用日语中既有的汉字词。但这些借词多停留在理解词汇的层面,缺乏旺盛的生命力,对汉语难以造成太大的影响。

3 日语汉字新词的容受

《日本国志》全书12志,几乎各志都与明治维新史有关。当介绍到明治维新以来的各项变革与举措时,必然要涉及到与新政有关的新事物、新概念。为此,黄遵宪从日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字新词。

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依照汉语的构词规则,创建了数量众多的汉字新词。这些新词中三字词明显多于二字词,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部分汉字词根,在构词功能方面开始起到词缀的作用。虽然它们的接续范围相对偏窄,但其数量庞大,可不断地生产出新词来。表述新事物、新概念的汉字新词,所含信息量大,传递信息能力强,很容易在中日间得以共享。本文为有别于前述的日语既有汉字词,对这部分汉字新词的借用称之为“容受”。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使用的日语汉字新词达381个,由于所占篇幅过大,仅以数量相对较多,汉语拼音“S”、“W”和“Z”开头的为例,总计有77个。

二字词:

少尉、少佐、少将、商会、商社、商业、商务、商品、商法、摄影、私诉、师团、市政、水质、税关、外债、温度、尉官、伪证、位记、伍长、造币、哲学、证券、证书、政党、职权、总裁、中佐、终审、卒族、专科、佐官

三字以上词:

敕任官、生理学、生物学、生殖器、司法官、事务局、十字军、收监状、书记局、书记官、输出税、卫生局、文部省、物理学、运转手、造币局、蒸汽船、蒸汽车、蒸汽罐、政治学、资本金、輜重兵、輜重科、植物园、中学校、重禁锢、助教授、总领事、奏任官、准士官、上下分权、私立学校、师范学校、司法警察、司令长官、士官学校、王政复古、无期徒刑、蒸汽器械、蒸汽机关、自由自主、治外法权、专门学校、外国语学校

上述这些词在幕末以前,无论是汉语的,还是日语的资料,均未能找到使用例。如“证书”一词,最早的用例出自1862年日本出版的『和英対訳袖珍辞書』,该词典将英语的“Testimonial”译为「証書、証拠」。幕末·明治初期,该词逐渐在日语中被使用。

- (4) 若し官府の證印を押さずして私に證書を取替すときは

(『西洋事情』初编卷之一, 福泽谕吉, 1866)

- (5) 何時に限らず交還すべきよしを約束し證書を與ふ商人此證書を懷にすれば

(『經濟小学』上编, 神田孝平译, 1867)

- (6) 兄弟の自ら名を書せる證書を持ざれば

(『西国立志編』第十三编, 中村正直译, 1870)

1886年,「証書」被『和英語林集成』第三版所收录。该词典将其解释为:“A writing certify to anyting, or as evidence; a deed, certificate”。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使用了“证书”一词,当是借自于日语。

- (7) 及十二年,大藏省停止买受,而公債证书之价日就低下矣。(食货志四,十五页)

又如“温度”一词,最早的用例同样出自『和英対訳袖珍辞書』,该词典将英语的“Temperature”译为「温度、程ヨキコト」。幕末・明治初期的语料中已经有不少「温度」的用例。

- (8) 筒の温度を常に変することなくして蒸気のみを収縮せしむる

(『西洋事情』外编卷之一, 福泽谕吉, 1867)

- (9) 夫草木の生長には、光線と温度と皆必要なる故に

(『米欧回覧実記』第三卷, 久米邦武, 1871)

1867年的初版『和英語林集成』,曾将其译为「陽氣、寒暖」,到了1872年的第二版,开始改译为「温度」。说明「温度」一词到明治初期才逐渐趋于定型。

在中国近代早期综合杂志《六合丛谈》(1857-58)中,多将其译为“寒暑”,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69)中,则将其译为“天气”。黄遵宪受日语的影响,在《日本国志》中使用了“温度”一词。

- (10) 毎日誌其寒暖晴雨及气之压力、空气之温度、地中之温度。(天文志,四页)

日本的明治时期是大量创建汉字新词的时代,即便是外来语,也常常用汉字来书写。这些借用汉字的音来书写的外来语也成为近代早期中日语言互动的对象。《日本国志》中借用的这一类日语外来语有“淡八菰”、“虎列刺”、“结罗米

特”、“米特”、“米得尔”等。如:

- (11) 明治五年归海军省管辖,所用地面积五千八百三十六结罗米特。(兵志六,五十五页)

- (12) 庆长十四年,烟草始来日本,初亦设禁,卒不能行,曰淡八菰,沿西人语也。

(礼俗志二,九页)

但这些借自日语的外来语,在信息传递方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在现代汉语中几乎都被淘汰了。即便是在日语中,除少数如「俱樂部」「浪漫」这样音义结合的个别词外,也都没有存活下来。所以,日语外来语对汉语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4 汉语本族词的回归

《日本国志》中的很多汉字新词,究其词源,或生成于中国早期的西学著作,或原本是汉语本族词,在近代日语中词义被转换。在由前近代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与西学东渐相关的汉字新词,因文化互动而被中日两国所共享。不少的汉语本族词是先在日语中流通使用,之后又回归到汉语中来的^[6]。

4.1 西学东渐中生成的汉语本族词

明末・清初,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期间虽然未能在传播福音方面如愿以偿,却在中国人助手的帮助下,通过著述将西方的新知识介绍给了中国。早期的西学著作有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1602)、艾儒略的《职方外纪》(1623)、南怀仁的《坤輿图说》(1674)等,多集中在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在这些用汉语撰写的著作中,使用了很多表述西学新知识的汉字词。这些汉字词有些是新创建的,有些则是对古汉语中的词汇赋予新的涵义后转换而来的。如:

- (13) 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

(《职方外纪》卷之二, 艾儒略, 1623)

- (14) 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

(《职方外纪》卷之二, 艾儒略, 1623)

例(13)与例(14)中的“文学”、“小学”二词分别源于《论语·先进》与《礼·王制》,被艾儒略赋予了新的涵义。《日本国志》中使用的汉字新词,源自于这一时期中国西学著作的有“赤道”、“测量”、

中日词汇交流与近代新词研究

“规则”、“几何”、“理学”、“数学”、“望远镜”、“文学”、“小学”等。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也随之入华。面对大量出现的新知识,汉语的固有词汇已不足以表述,急需创建与之相适应的新词。国人中林则徐、魏源等先哲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为创建新词进行了尝试。更多的是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中国知识人的协助下,用汉字创造出了一批与新事物、新概念相对应的新词。这些汉字新词多出现在他们编撰出版的词典、杂志与科学著作中。如:

(15) 绅士院约五百五十人,皆出席民选举,以七年为期。 (《遐迩贯珍》第三号,1853)

(16) 英伦银行二十二年底通计貯行银四千三百五十万零二千四百圆,而三年底则倍之。 (《遐迩贯珍》第十一号,1855)

(17) 现国债尚存三千零七十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九圆。 (《六合丛谈》卷之三,1857)

(18) 诸国之公法,不审战者理之曲直,助之之国攻敌,即可享交战之权利。

(《万国公法》卷一,丁韪良,1864)

《日本国志》中使用的汉字新词,很多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西学著作中找到词源。这些词汇有:

磅、病院、博物馆、代数、电报、发行、翻译、公法、公判、公使、国库、国会、国家、国债、寒暑表、化学、教授、经费、空气、领事、马力、免税、民选、炮兵、平等、权利、试验、使馆、特权、铁道、外交、新闻、新闻纸、选举、压力、演习、议院、议会、医师、医院、银行、邮政、预科、蒸汽、政府、政治、总理、助教。

中国不同时期出版的西学著作先后被介绍到日本,甚至还在幕末·明治初期被翻刻出版,成为日本人了解西方,学习西学的重要渠道。幕末·明治初期的日本知识人在从事著述活动时,多苦于表述新事物、新概念的术语不足,中国西学著作中的汉字新词为文明开化过程中的日本人提供了丰富的新词资源,为近代日本的信息转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

(19) 譬えは或は国債を償はす或は通用金の位

を卑くし

(『西洋事情』初编卷之一,福泽谕吉,1866)

(20) 推挙に应す可き権及ぶ選挙を為す権每品位各其特例あり

(『泰西国法論』卷二第七编,津田真一郎,1868)

(21) 人民も稍權利を得るに似たれども、其卑屈不信の気風は依然として旧に異ならず

(『学問のすすめ』第四编,福泽谕吉,1872)

(22) 十銭ヨリ一円一円ヨリ千円万円遂ニハ幾百万円ノ元金ヲ集メタル銀行ノ支配人ト為リ。

(『学問のすすめ』第十七编,福泽谕吉,1872)

例(19)~例(22)中的「国債」「選挙」「權利」「銀行」等词,正如例(15)~例(18)所示,均出自于中国早期的西学著作。但是,上述汉字新词,虽生成于中国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汉语中被认知的程度却很有限。如英语的“Bank”一词,在同时期上海出版的中文杂志《六合丛谈》中,就分别被译成了“银房”和“银肆”。1872年,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编著的《英华萃林韵府》在上海出版。在该词典中,“Bank”一词则被译为“钱局”、“钱店”。马西尼指出,直到1901年,翻译家严复仍在尝试用“钞商”、“钞店”及音译词“版克”来翻译“Bank”^[7]。如今这些已被汉语广泛使用的本族词,虽有别于从日语直接借入的汉字词,但由于是先在日语中流通使用,后受日语影响才回归汉语的,从广义讲也应看作借词。黄遵宪较早受到日语的影响,积极地使用了这些本族词,也间接地促进了这些词的回归。

4.2 在日语中词义转换的本族词

幕末·明治时期,在日语中使用的汉字新词,还有很多原本是古汉语中的词汇,是日本人通过再生转用的方法,赋予其新涵义后转换而成的。这种新词的生成方法,在前述的中国西学著作中就已经存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为解决新名词、新术语严重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活用了这一方法。

《日本国志》中使用的汉字新词,可判定源于古汉语,后被日语再生转用的本族词主要有以下这些。

保证、本科、辩护、剥夺、簿记、布告、参议、参谋、逮捕、灯台、法学、法律、罚金、分析、改革、告诉、